

# 現實主義還是修正主義？

《人民文學》編輯部編

作家出版社

---

# 现实主义还是修正主义？

《人民文学》编辑部编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九 年 · 北 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城区朝内2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193 字数95 000 开本787×1092<sup>1</sup>/<sub>32</sub> 印张5<sup>1</sup>/<sub>2</sub> 插页4

1959年2月北京第1版 1959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册

定价(4) 0.47元

## 出版說明

从一九五六年起到一九五七年夏，国际上出現了一股反苏反共的政治逆流，国内资产阶级右派气焰嚣张，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了猖狂的进攻。这时，在文艺的陣地上，右派分子秦兆阳插起了一面向党的文学事业进攻的大白旗。他不仅写出了象“现实主义——广闊的道路”那样的論文——系統的提出了修正主义的文学綱領，根本反对党对文学事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而且在他倡导所謂“干預生活”和“揭露生活阴暗面”的口号下，以他所主持的“人民文学”为陣地，大量推荐和发表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經過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秦兆阳的反党阴谋遭到可耻的破产，他的全部罪行得以彻底清算。这个集子里十几篇文章，就是在批判秦兆阳过程中，发表在“人民日报”、“文艺报”、“人民文学”上的一部分作品。这些文章，对秦兆阳的右派言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文艺观点和两面派的手法，进行了揭露和剖析。并有专文对“人民文学”上的几株毒草，如“本报内部消息”（刘宾雁）、“改选”（李国文）、“沉默”

（何又化——即秦兆阳）等，作了分析和批判。毒草锄掉可以变成培植社会主义文学花朵的良好肥料。这个集子可算是文艺战线上一场大辩论中的一项重要战果。

“人民文学”编辑部

1958年10月

## 目 次

秦兆阳的破产 .....	刘白羽 ( 1 )
现实主义还是修正主义? .....	林默涵 (22)
应当老实些 .....	言 直 (48)
好一个“改进计划”! .....	张光年 (59)
谈“毁誉” .....	严文井 (74)
从“尖锐之风”说到风的尖锐 .....	石 燕 (80)
所谓“灵魂”的“挖掘” .....	贾 霁 (84)
谈“增灶撤军” .....	唐 弢 (90)
秦兆阳的身手 .....	朱 寨 (94)
秦兆阳的前言和后语 .....	常 础 (100)
评何直在文艺批评上的修正主义观点 .....	李希凡 (114)
秦兆阳眼中的农村 .....	樵 漁 (127)
评“沈默” .....	艾 蕪 (145)
评“本报内部消息” .....	严文井 (151)
一株攻击党的领导的毒草	
——评“改选” .....	馬前卒 (164)

## 秦兆阳的破产

——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  
的发言

刘白羽

批判秦兆阳这个彻头彻尾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斗争，是文学战线上一场深刻的阶级斗争。斗争再一次地教育我们：只有彻底地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才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我们与秦兆阳之间的分歧和斗争，就是这样一场根本不可调和的斗争。

我为什么要提出这问题呢？因为秦兆阳直到最后还妄图掩饰他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根本的分歧。请看：一月二十三、二十四两日他在批判他的会议上的长篇发言。奇怪得很，他好象一下子从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一文中找到了他自己犯错误的根源了。他引用了“这是因为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里，都存在一些与无产阶级并立的广泛的小资产阶级”这一句话。但是我们必须指出，施展诡辩术割裂马列主义词句，正是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特点。秦兆阳为什么只死死抓住“小资产阶级”这句话，而有意地忽略列宁文章中所说的修正主义“是马

克思主义内部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这一点呢？列宁还严正地指出了与修正主义的决裂：“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将使一切争论问题尖锐化，将把一切分歧都集中到对于决定群众行动有最直接意义的各点上，将迫使我们在斗争激烈时区分友敌，抛开那些恶劣的同盟者，以便给予敌人以致命的打击。”因此要求“无产阶级不顾市侩们如何动摇与懦弱，而向前迈进去争取本身事业的完全胜利。”<sup>①</sup>秦兆阳所以这样做，十分清楚，就是想躲在“小资产阶级”这面盾牌后面，而掩饰根本的敌我矛盾罢了。

关于修正主义的阶级基础及其危害性，毛泽东同志早已指出：“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sup>②</sup>这说明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有着不同的阶级基础，因此，教条主义一般是党内问题，修正主义一般是党外问题。这一根本分歧是客观存在，秦兆阳妄想回避或掩饰这一客观存在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问秦兆阳，你向党、向社会主义所发动的攻

---

① 以上引文均见：列宁：“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一文。

② 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击，不是资产阶级在最后崩溃时的疯狂反扑又是什么？你的反动的阶级情绪，早已经跃然纸上了。秦兆阳在“论尖锐之风”<sup>①</sup>“左顾右盼”<sup>②</sup>，特别是在给刘宾雁的密信中，就露骨地表示了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活得那样不舒畅、不愉快，充满绝望情绪，而非斗争不可了。他在“从特写的真实性谈起”<sup>③</sup>中显明地提出“应该从各方面来改变这种情况的时候了！”值得注意的，既是“从各方面”，那就不仅仅从文学；而且还要从政治、经济各个方面，来“改变”我们的社会主义生活。所谓是“时候”，就是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已经高涨起来了。所谓“改变”，是按着秦兆阳等头脑中的“资产阶级王国”的面貌改造世界，还是按着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面貌来改造世界？如是前者，结论只有一个，就是粉碎我们的社会主义现状；如是后者，结论也只有一个，就是粉碎秦兆阳等的攻击。这不是两个敌对阶级不可调和的根本分歧是什么？

文学是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形象化的表现。高尔基认为“作家是阶级的眼睛、耳朵和声音”，这是非常深刻的认识。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这一段时间内，前进的社会主义巨流与反社会主义的逆流相冲激，谁反对革命？谁保卫革命？再没有比这时候更清楚的了。泡沫和渣滓被

① “文艺学习”一九五六年八月号。

② “人民文学”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号。

③ “人民文学”一九五六年六月号。

巨浪浮了上来。所以从国际到国内，在这时出现了各色各样的文学上的修正主义者。秦兆阳在他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sup>①</sup>的结尾处，有一段话讲得很明白：

我觉得，教条主义对于文学艺术的束缚，这不光是中国的情况，而且是带世界性的情况，也许正因为它是带世界性的情况，所以才更加难以克服吧？

看！秦兆阳真是一个“大智大勇者”，他立志要解决“世界性”的问题哩！通过这段话，秦兆阳已经把他自己和整个反社会主义逆流紧密地联系起来。

秦兆阳曾说，他发表他的修正主义论文，只是为了展开学术讨论。又说，别人对他的批判和斗争，是把他的学术讨论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了。

真妙极了！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可是难道有与政治完全无关的文学吗？秦兆阳那个以一个时代的宣言姿态出现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难道真是与政治无关的学术讨论吗？当然哪，资产阶级从来都是这样与我们作斗争的。当我们抓住他们的罪证时，他便嘻皮笑脸地说：我这是“为艺术而艺术”呀，我这是“无思想的文学”呀！……这种斗争手段我们早已领教过了。

在这里，我想从秦兆阳的理论与实践，谈一谈文学上修正主义者的几个根本特点。

---

① “人民文学”一九五六年九月号。

(一)文学上修正主义者大肆叫嚣要取消党对文学的领导。我們知道,叛徒法斯特曾向社会主义要所謂“最充分的自由权利”。秦兆阳呢,他将党所领导的文艺现状形容成为“千万条教条主义的繩子”。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一日給邵荃麟同志的信中,更进一步給党的领导开了一张罪状,“……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行政方式……”因而他在一九五七年四、五月間所写的另一篇未发表的文章中提出“出路何在?”这样的根本問題。

出路何在?就是取消文学是党的、阶级的事业的一部分的党性原則,而恢复并发展他們的资产阶级文学。秦兆阳就是从这儿开始他的战斗的。当他主持“人民文学”工作时,在編輯部里面,不是闡明党的文艺政策,而是散布领导干預过多的論調。他还千方百计地排斥、抗拒党的领导。我在这里可以举出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党早已发觉,在他主持之下的刊物,排斥作家的現象愈来愈严重,因而提出应当广泛地团結作家。但是这一意見却激恼了秦兆阳,他說如要团結作家就会降低刊物的質量,并且尽情地污蔑、嘲笑了作家們一番。所以如此,原来是这一意見妨碍了他对广大作家的关門,而专门收集象刘宾雁、刘紹棠等右派作者搞一个反社会主义的文学集团的計划。后来,秦兆阳就更狂妄地主张要取消作家协会的書記处,并且挑战地說,你們要领导就“用笔来领导”吧!在反社会主义浪潮最勇猛时,他就在編輯部里面公开提出,

“如果办一个可以由自己作主的刊物，我可以再干十年二十年，甚至当一辈子編輯，但象目前这样，我不想干，也不能干了。”还狂妄无知的說：“我若是別林斯基，你們就都是杜勃罗留波夫。”他的論文“现实主义——广闊的道路”就是为了实现这理想的未来局面，而从理論到具体做法，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党对文学事业的领导展开全面攻击的綱領。秦兆阳就是这样伸出手向党要“由自己作主”而取消党的领导的自由。关于文学的自由，列宁早已把那种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伪的自由，批判得体无完肤了。列宁說，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文学才是真正自由的文学。秦兆阳要的当然不是这样的自由，由秦兆阳“自主”而发表的如刘宾雁的“本报內部消息”等恶意誹謗社会主义生活的作品，就可看出，秦兆阳所要求的自由到底是什么样的自由了。

(二)文学上的修正主义者都把社会主义社会說成一片黑暗。秦兆阳在“日常談話录”<sup>①</sup>中說：“关在屋子里写作的时候，首先就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生活的真实，总是謹防背后有人来抓辮子，神經紧张，左顧右盼，真是一种說不出来的味道！”(人們会感到，这正是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这段時間內，象秦兆阳这样的人自己的画像。不过使他們紧张的，不是新社会压迫了他

① “人民文学”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号

們，而是他們面臨着的資產階級崩潰而引起的緊張情緒……）“自己感到最激動的、最嚴正最尖銳的題材不敢寫，倒盡去寫一些輕飄飄的東西。一舉一動，總是左顧右盼，心神不安，就只好去找那最輕易的路子走。”（這是他在反社會主義浪潮前面跪倒，對於自己曾經寫過歌頌新生活的“農村散記”的一種懺悔。如若不信，請看他自己的話，他說他在“本報內部消息”面前是“使我興奮而且自愧不如……”一個階級異己分子在敵人進攻面前，註定要作叛徒，但可惡的是叛徒總是把原因歸咎於我們的社會，而立刻反戈相擊了。）在“從特寫的真实性談起”中說：“在現實生活里並不是沒有常常被一些尖銳的事情所激動，……但是他們不敢寫，他們常常為此而苦惱，……怕出漏子，……更重要的是有一種習慣勢力拘束了他們的積極性。”（所謂“一種習慣勢力”，不言而喻，指的是黨、是社會主義社會。而這正是秦兆陽所要“克服”或“改變”的，也不言而喻了。）

關於自由，前面已談過，這裡我想着重地批判一下秦兆陽的社會觀。誰都知道，我們正處在轟轟烈烈建設社會主義的年代，由於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革命完成，被解放的六億人民掙脫了在物質生活上和精神生活上的種種束縛，對舊社會的習慣勢力來了一個大的衝擊，人與人之間出現了嶄新的關係，共產主義精神在生長、在發揚，這一切都是被人們所熱誠歡迎的。但是，對於秦兆

阳來說，这一切却是不愉快的事。事情就是如此：你是劳动人民，你就只能感到“失去一条鎖鏈，得到全部幸福生活”的心情暢快；你是資產階級，你必然为了你們“精神貴族”“剝削特權”的消逝而滿懷仇恨。法斯特不就攻击社会主义国家是“沒有公民自由的社会主义”，是“沒有艺术的自由創作權利的社会主义”嗎？現代修正主义者把无产階級專政污蔑为“蜕化”的“官僚集团”，其目的就是否定无产階級專政。秦兆阳也不例外，当一股地主、富农的妖风从乡村卷来时，秦兆阳立刻声言他到处总是看到“缺点”，他成为农村生活“黑曆”的积极宣传者。不可設想，一种反动的社会观不在他的言行中有所表现，特别是階級斗争愈剧烈，他們的态度也就愈露骨。一九五七年春天，秦兆阳发展到了和社会主义社会势难兩立的地步。这集中地反映在他給刘宾雁的信里：“我如处在风雨之中，心情之煩乱，为若干年来所未有。”他污蔑党的生活“未見得沒有肮脏的东西”。但又說“自愧沒有改变环境的能力”。在这稍前几个月他还說过：“毀誉只隔着一层紙，作者稍不小心就会由被誉而走向被毀”等等。好了，我不想再作什么“心灵的探索”了！但是，階級斗争是尖銳的，秦兆阳从他对党、对社会的阴暗心理，开始了“干預生活”的挑战。

(三)文学上的修正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总是从污蔑和否定社会主义文学开始的，他們极力地要埋葬掉社

会主义现实主义，他們对于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特别地反感。

秦兆阳的綱領式論文“现实主义——广闊的道路”，总括起一句話就是要文学退回资产阶级的往日。这和馮雪峯是异曲同工，他們总是以无限甜蜜的心情陶醉于十九世紀的资产阶级文学。这是一个悲剧：他們象木乃伊一样，他們的躯壳在今天，但是他們的精神在往日。秦兆阳否定社会主义文学，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實質上他也否定现实主义。他将文学看作脱离阶级、时代的什么真空的存在，他把现实主义的发展描画成为盲目的发展，他根本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与以前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原则的区别。他說：“……人們却很难說明它們是那一类现实主义的作品。因此，想从现实主义文学的内容特点上将新旧两个时代的文学划分出一条絕對的不同的界綫来，是有困难的。”

当然，社会主义文化是人类文化中一切优秀传统的繼承与发展，但秦兆阳极力地否定这一界限，其目的就是反对在文学中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

他的这个反馬克思主义的公式是这样的：

一、作家脑子里如果有“某种固定的抽象的‘社会主义精神’和願望”，就会使作品“成为某种政治概念的传声筒”。

二、社会主义精神“存在于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

之中”，如若“讓血肉生动的客觀真实去服从这种抽象的固定的主观上的东西（即作家脑子里的社会主义精神）”，便会使“作品脱离客觀真实”。

这儿，秦兆阳玩弄了一个典型的诡辯术手法，把主观与客觀截然对立起来了。按照他的邏輯，就是作家头脑中不但不能有社会主义精神；連社会主义願望也不能有，如果有了，就会使作品脱离客觀真实，就会成为政治概念的传声筒。實質上，秦兆阳不过是又一次重复着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反动理論，反对作家应该具有馬克思主义世界觀罢了。

我們認為馬克思主义真理的火炬照亮了生活的深刻的进程，人們通过它才能真正真实地反映生活；秦兆阳却从根本上閹割了馬克思主义的战斗的原則，从而取消了革命作家自覺的思想武装，使作家們失去其認識现实、反映现实的力量。其結果，只能墮落到依从于他們所謂的“血肉生动的客觀真实”的盲目自发論。持此种見解的人，当然厌恶文学的党性原則、作家的馬克思主义世界觀以及艺术服从政治了。秦兆阳只能唱出沒落資产階級早已唱膩了的老調：“首先必須是艺术的、真实的，然后它才是文学”；“艺术性与思想性并重”……他片面地強調艺术性，強調所謂“艺术的完善”，而否定思想性。

（四）文学上的修正主义者，既然反对社会主义文学，必然就販賣資产階級文艺观点。



在文学中不可能有什么沒有思想影响的真空文学，不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就用资本主义精神教育人，二者必居其一。秦兆阳要求“只要忠实于客观真实”。怎样才能“忠实于客观真实”？不是早已有人提出作家的“忠誠”問題嗎？秦兆阳除了提出离开阶级的抽象的“忠实”之外，只能抬出离开阶级的抽象的“人生的責任”，因此如何真实，他只能訴之于“独特而深沉的眼光和感情”，要“深沉的眼光”不要“世俗的眼光”。总之，就是他所謂的什么“深刻地凝視生活的习惯”。何謂“深沉的眼光”？何謂“世俗的眼光”？从“现实主义——广濶的道路”和“从特写的真实性談起”等文中，我們可以看得十分清楚，所謂深沉的眼光就是“干預生活”，就是用阴黯心理和眼光暴露社会主义的“黑暗”；至于热爱生活的作品，当然是“輕飘飘的东西”，是沒有“从千万条教条主义的繩子下解放出来”，是“世俗的眼光”了。这还有什么馬克思主义气味？沿着这条路滑下去，秦兆阳只有乞灵于“追求生活的真理”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真理”了。

秦兆阳就这样，从这一場保卫社会主义和反对社会主义的剧烈斗争中，暴露出真正右派的嘴脸。

社会主义文学是真正劳动人民的文学，是人类历史中最光輝的文学。周揚同志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場大辯論”中談到：

为劳动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根本方針，它以无